

本刊主编：刘晓立
版式统筹：佟德钊
联系电话：0311-88643113
投稿邮箱：liuxiaoli0119@163.com

古籍保护

专刊

藏书报

2017年1月23日

第2期（总第3期）

藏书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主办



为一代学者赵万里“塑像”

他出生在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
他是浙江海宁书香门第之家的
骄傲；

他自幼熟读诗书、精通文史；
他16岁考入今南京大学文学院，
师从吴梅习词学。

他还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门生
兼助手；

他在图书馆从事善本采访、编目、
保存工作长达50余年；

他精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
他的著作至今是古籍版本学人
的案头必备；

他就是著名文献学家赵万里。

赵万里

（1905-1980）

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海宁市人民政府赠

2016年12月底，赵万里先生铜像揭幕仪式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举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海宁市委副书记沈勤丽，南京艺术学院雕塑系主任、雕塑家尹悟铭，赵万里先生家人，版本目录学界专家学者，国图员工代表40余人出席了活动。仪式由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主持。

开幕式上，作为捐赠方、家乡人民的代表海宁市委副书记沈勤丽说：

赵万里先生是海宁文化名人的杰出代表，为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海宁人民的骄傲。雕像的落成，将激励后人始终以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崇高人格为坐标，在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路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回顾了赵先生作为古籍保护事业先驱，为国家图书馆访书护书的感人事迹，指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进入第十

个年头，普查、修复、人才培养等各项工作都处于攻坚阶段，希望广大古籍工作者以赵先生为楷模，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提升认识，精进学问，强化业务，真正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和守护者。

雕塑家尹悟铭先生、赵万里先生家人代表、图书馆学界专家学者从各自角度表达对赵先生一生学高德范的仰慕与追思。本期专刊特推出“一代学者赵万里”专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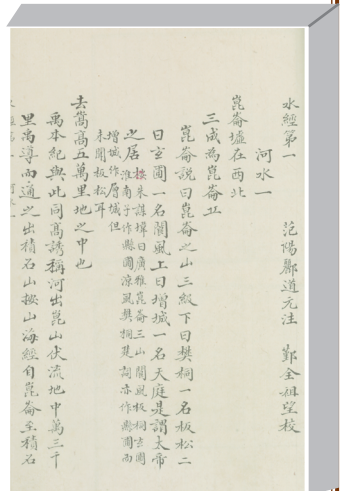
（详见10—12版）

近期，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中心图书馆以最美“颜值”引来热议，这是阅读界可圈可点的好气象。言及“美”，还令我回想起2016年8月末在天津图书馆一次“美”的邂逅，于心间萦绕迄今400余夜……

邂逅全祖望校《水经注》钞本

——从胡适借书想起的

□葛芸生



天津图书馆藏全氏校本《水经注》

与《水经注》短暂的邂逅结束时刻，心中也有点依依不舍。

“学术研究靠一人之力是难以穷尽的。在不同时间段，都会有不同的研究者，拿出不同的研究成果。”李国庆主任的这句话，令我茅塞顿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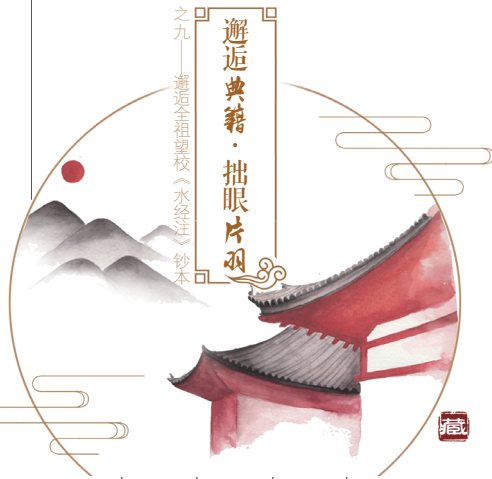
李国庆主任补充介绍说：为让更多致力于《水经注》研究的学者和读者，都能利用天津图书馆的藏本，于十几年前已联系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了。这本有故事的古籍，定能引出更多研究者和读者的精彩故事。

此刻，我只想引用逝世不久的陈桥驿教授的两段话，与更多古籍保护者共勉：

从《水经注》里学什么？陈桥驿说：“今天，人们对于这部名作的研究，已经不仅是欣赏文字，而是通过历史地理学的分析，吸取它的科学内容了。”

如何推进《水经注》的研究？他说：“建议郦学界通力合作，编纂一部理想的郦注新版本：即统一的体例，正确的文字，完整的内容，科学的注疏，详悉的地图。”

拙眼愚见：当下谁来攀上前贤的肩膀？



葛芸生

学习传播保护

邂逅现场 聆听胡适借阅《水经注》的故事

那天带我邂逅全祖望校《水经注》孤本的，是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李国庆。

李主任告诉我：这是一部分量很重、价值很大、故事很多的孤本、钞本。他特别说起，胡适先生是研究《水经注》的大家，上世纪40年代，他在获悉天津市立图书馆（即今天天津图书馆的前身）藏有全祖望祖孙三代校注的《水经注》钞本后，即刻委托文字学家唐兰到天津联系借阅。

胡适在研读天津图书馆的藏本后，发现不少与自己以往观点不一致的记载，他自认需要修改原有观点，并想利用这个版本多写几篇文章与众分享。

国民党准备撤离大陆时，馆长井守文担心这部《水经注》，有可能随同胡适先生自藏的古籍，一并被带离北平。于是，多次以书信与胡适沟通，说明借期比较久了，望能尽早归还。胡适回复表示肯定归还，只是目前仍在使用中。可以想象，胡适对这部《水经注》情有独钟，爱不释手，想着多看一天是一天。因时势所迫，井守文馆长派员专程前往北平，从胡适先生手里取了回来。

据李主任分析，胡适先生之所以爱不释手，恰好彰显此书版本价值之高；但作为公共图书馆，保护好每部古籍是应尽的职责。此事最终算是圆满的，胡适先生“解渴”了，天图也尽职了。

行前我仅知道，北魏酈道元为注释无名氏留下的《水经》，实地考察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搜集相关遗迹、人物的掌故与传说，由原本的一万字扩编为三十多万字的《水经注》。酈本《水经注》尽享“宇宙未有之奇书”的盛誉，开创了“一门包容万象的学问”——酈学。

对于酈学，我是门外汉，虽说在纪录片的制作时，尝试过地理人文与地名故事，但邂逅之后我查阅酈道元的资料时羞愧得无地自容。

据载：《水经注》所记河流达1252条，从发源到入海，举凡干流、支流、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水量和季节变化，含沙量、冰期以及沿河瀑布、急流、湖泊等均有详细记载。不仅这些，还记有高地如山、岳、峰、岭、坂、冈、丘、阜、岗、障、峰、矾等地名近2000处，记有县城、城邑共2800座，还记有如金、银、铜、铁、锡、汞矿以及雄黄、硫黄、盐、石墨、云母、石英、玉、石材等非金属矿物和能源矿物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甚至在兵要地理方面，记载了从古以来的大小战役不下300次。

李主任跟我讲：凡史学研究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都要研究《水经注》，因为它的内容博大精深，重点涉及史、地两大块，而史地又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酈道元《水经注》稿本，完成于1400多年前，雕板印刷尚未出现，书籍流传是通过传抄来实现的。稿本长期归朝廷秘藏，《水经注》成了国之机密，直至北宋始有部分亡佚缺失的版本在民间流传。于是，引来众多学人为之辑佚、注疏、校勘，各种名目的版本令人眼花缭乱。

卷藏三昧：不能回避的『戴震赵案』

在查阅资料中，我循着胡适的足迹，陷入《水经注》的一段旧案，慢慢体会到“一卷水经反复勘，浊河清际笑冬烘”！

《水经注》的版本于乾隆年间曾引起轩然大波，涉案焦点在于“谁偷了谁的《水经注》”，按今日说法属版权之争。涉案的三位主角都是学术界、收藏界响当当的扛鼎人物：戴震、赵一清和全祖望。诸多前辈名流，如魏源、段玉裁、杨守敬、张穆、王国维等此后也相继坦陈己见。

居上风并持续百多年之久的看法，指戴震袭用了赵一清的校注。胡适于1943年，本着为戴震“伸冤”“打抱不平”的初心，矢志“辩冤白谤”。在重审“戴袭赵案”的十余年间，胡适自喻“兼起法官、律师、侦探”于一身。

如今回溯历史，姑且让旧案是是非非交由读者明鉴，先贤功过得失皆请行家掂量。

我眼拙，就胡适在《水经注》研究中的几点难能可贵之处，略陈数言，与古籍保护研究者交流。

其一，胡适在研读天津图书馆藏全祖望五校本时，发现自己以往对五校本的序目、题辞系伪造的判断错了，他公开撰文修正，并利用手中的版本写了几篇文章与众分享。胡适作为著名学者，勇于纠正自身错误，更把纠错视为“愉快享受”的胸襟，令我感动。胡适不认为做学问只能“有苦无乐”，他说：自己之所以对《水经注》深感兴趣，“正因为处处发现自己的错误”。而这种发现，是要给我们一生一点无上的愉快享受。

其二，胡适结缘《水经注》，是其投入晚年学术研究中的最大一项工程。其实，上世纪40年代胡适由美国回来后，自思有几年没写文章了，决心要安排自我训练，于是他“找一个很小的题目《水经注》，这样又弄了十七年”。

其间在持续调研中，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了《水经注》的若干版本，又在数年里搜集国内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陕西、台湾等地藏有的版本与有关文献，撰写成十来个专题的上百万文稿。

胡适见过《水经注》的版本算是最多的。不仅如此，他又在北京大学举办“《水经注》版本展”，除自藏的版本外，还邀请国内各图书馆、藏书楼，展陈宋刻、明抄至清乾隆三大家藏本达九类、四十一种，可谓规模空前。

胡适逝世后出版的《胡适手稿》十集30册中，有关《水经注》的论述、函札、序跋、考释等文字，竟占了六集18册之多。他为酈学和《水经注》的学术研究，献出的心血值得后人铭记。

其三，胡适为人，尽管起始为戴震辩诬时，存有情感上的纠结乃至影响到某些不当的判断，但他勇于革新，如1954年他在给洪业的信函里，回顾道：“十年来，重审戴赵《水经注》案，虽然有几分为人辩诬白谤的动机，其实是为了要给自己一点严格的方法上的训练。”即他坚守的仍是“实录跟着证据走”的理念。晚年胡适，再三以四个字自勉并勉人——“勤谨和缓”，看似平平淡淡，实则他历尽学术磨砺后的彻悟，言极简，意隽永。

在比较数十种《水经注》校本后，胡适曾发出“三难得”的感叹：“读者之难得，会心读者之难得，知己之难得，真可感叹！”作为读者当会感恩先贤学者的情怀，努力养成自己能与著者沟通的功底。

启功先生与碑帖鉴赏

《坚净居丛帖》读后记

□北京 王连起

启功先生不仅对碑帖相关的金石文献、书画著录、校碑考帖书籍非常熟悉，而且于经史子集中有关的中国古代文史方面知识，亦有深入了解。其深谙古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又精研历代书法，凡名家墨迹、碑帖摹刻之优劣、鉴藏流传之经过，皆了然于胸。他有数十年临池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对书法字体结构有深入独到研究，用于古书画特别是碑帖鉴定，便有了一种触类旁通、游刃有余的居高临下优势。这方面的例证很多，仅举几例如下：

上世纪80年代初，某地发现了一部宋代名帖《潭帖》，被推荐到文物出版社出版。启先生一看，即指出其伪：《潭帖》刻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不可能刻有宋徽宗、南宋高宗的题和画押。帖贾无知，造出这样的破绽，不足为怪，但要为国家文博单位做专业工作，这样起码的文史知识是不能少的。而启先生挟国学大师之博学，来审视碑帖问题，自然就可同日而语了。

又：日本友人捐赠给故宫一部法帖，帖上有三个题签：清王铎题为《宋米芾帖》，无名者题为《宋名贤帖》，日本宇野雪村题为《宋拓宝晋斋帖》。帖后有清翁同龢两跋，虽言及程兰川《帖考》记有《松桂堂帖》事，但不能断。启功先生过目，即断“此米友仁孙巨容刻其曾祖所藏《宝晋斋法书》，与夫溪堂手泽一册，即所谓《松桂堂帖》者也”。因为先生不仅熟悉相关的文献资料，而且，这之前就曾留意过《松桂堂帖》的

相关问题，如《松桂堂帖》的帖目等。

近来，晚清裴景福曾经收藏的所谓赵子固《落水兰亭》现世，有人到处喊要国家重金收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影印的清乾隆内府摹刻《落水兰亭》（有启功先生题跋四十余行），考辨《落水兰亭》的问题，指出裴氏藏本，是“伪中之伪，歧中之歧”。先生的题跋，对《落水兰亭》的种种问题，如不同本的鉴藏流传，前人的考证得失等等，了解得极为详实明白，特别是关于《落水兰亭》的真伪判断，相对于那种以耳代目、道听途说、不懂装懂的言论，尤其显得准确和有实际意义。

启功先生鉴赏碑帖，顾名思义，是通过先生鉴藏评判考校的碑帖，其重要意义是让人们了解先生对碑帖赏鉴研究的方法和见解，而不是这些碑帖的版本价值。先生为清室帝胄，生在民国，早年家道中落，中学不能卒业，虽自幼爱好书画，却无力购求善本。中年书画名声俱起，却命运坎坷；晚年德艺双馨，名震寰宇，到了取富贵如探囊之际，先生却淡泊名利，志在捐资助学，并未用意于个人收藏。其版本的价值必是无法同博物馆所藏善本相提并论的。但是，以先生的慧眼，先生的学识，以及先生对书法的理解和对碑帖的精鉴，这些碑帖（包括影印本）一经先生题跋，即可使人领略到其书法的妙处，了解了版本的优劣，增添了鉴赏甚至考据方面的知识，可谓点铁成金。况且，以先生对碑帖的喜爱，长期的关注，甚至是节衣缩食的搜集，这些碑帖中也并不乏精品，明拓《张猛龙碑》便是其中之一。

这本《张猛龙碑》，蝉翼拓，拓手精工，墨色浓淡燥湿恰到好处，字口清晰，锋棱俱见，神完气足。先生得此碑时正值其母去世不久，经济颇为困难，但因特别喜爱此碑的书法，所以最后以所藏旧帖七种易得。碑中适有“冬温夏清”四字无损。先生缘此想起自己自幼失怙，靠母亲抚养，多年艰辛，而今竟失去侍奉的机会，情何以堪！所以碑后题诗中有：“小人何处通温清，一字千金泪数行。”

启功先生有论书绝句百首，论《张猛龙碑》竟占了六首。其最后一首云：“出墨无端又入杨，前摹松雪后香光。如今只爱张神同，一剂强心健古方。”先生的注释中有“余于书，初学欧碑、颜碑，不解其下笔处，更无论使转也。继见赵书墨迹，逐其点画，不能贯穿篇章。乃学董，又学米，行联势贯矣，单提一字，竟不成形，且骨力疲软，无以自振。重阅《张猛龙碑》，乃大有领略焉”。盖赵与董都属于注重笔法精美一路，初学者往往着意点画的形态修饰，而疏略了字结构的协调和体势的劲挺。先生称此碑为强心健骨方，正是补学赵、学米、学董的不足。但先生眼界宽广，学书转益多师，博采众长，书法家之外，更是一位学者，所以即便是最喜爱的碑或帖，亦要将其置于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来审视其优劣得失。他评此碑为“较《龙门造像》，自属工致，但视《刁遵》《敬

显隽》等，又略见刀痕。惟其于书丹笔迹，在有合有离之间，适得生熟甜辣味外之味，此所以可望而难追也”。

唐《栖岩寺智通禅师塔铭》，是唐碑中行书书碑的佳作，但研究碑帖的人很少论及。此碑中有先生边题六，后跋一。凡碑中涉及的人物官职、地名沿革、文献著述，皆一一考校明白，对其书法艺术之特征，师承影响之源流，评判尤为准确。先生称此碑“天真烂漫，寓古淡于道媚，足以上逼山阴，下开米老”。较之当时名家，先生边跋有补充说明：“李北海过能，张从申稍俗。”由此可见先生对此碑的重视。

对柳公权《玄秘塔碑》，先生的论书绝句百首也有论及。先生总结自己的学书历程云：“先摹赵董后欧阳，晚爱诚悬竟体芳。偶作擎窠钉壁看，旁人多说似成王。”此碑的先生题记云“余获此碑，临写最勤，十载以来，已有十余本”，“一九九五年复临一本毕，此余八十岁后所临第一通”。可见先生于此碑的用功之勤。大师巨匠的天赋和成就，不是人人所能企及，但他们的勤奋，却人人应当效法。看先生的赏鉴碑帖，既是专门的学问研究，又有学书实践的心得体会。不仅是艺术审美的阐发，还时时可见其破除前人玄论谬说的警策精辟。先生虽称柳公权书是“竟体芳”，但对历史上柳公权所谓“笔谏”即“心正则笔正”的说法，则给以辛辣的讽刺批判。论书绝句题柳书《神策军碑》《玄秘塔碑》：“劲媚虚从笔正论，更将心正哄愚人。书碑试问心何在，谏阍谏僧颂禁军。”唐代中期，政治昏暗，宦官操纵御林军，专横跋扈，皇帝死生更替亦出其手，更有甘露之变的惨祸，玄秘塔主僧端甫，鬻佞比于权奸。唐宪宗迎佛骨即是出于端甫蛊惑，韩愈谏而贬官潮州，而柳公权却一一为之书碑。先生问道：“当其下笔时，心在肺腑之间耶？抑在肘腋之后耶？”这种学书和做人牵强地扯在一起的说法，缘于古代将艺术视为兴教化助人伦的工具的封建思想。到了宋代道学家朱熹那里，更发展到书学钟繇（“汉之篡贼”），字写得好也要惭愧，书学颜真卿（“唐之忠臣”），字写得丑也可以骄傲（朱熹《朱文公集》卷八十一《题曹操帖》）！这种混淆不同性质门类事物特质的谬说，今天当然要给以分析清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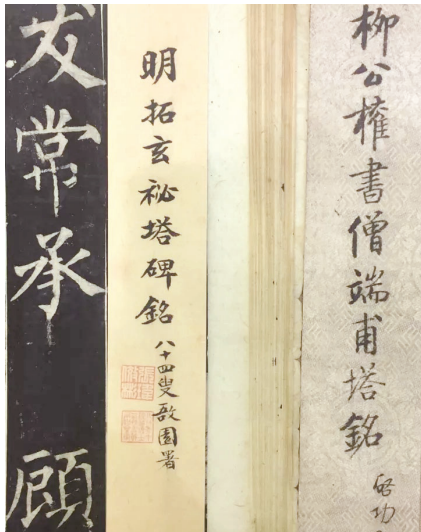
先生的鉴赏意见，很多是题于影印本上，如王氏《一门法书》（即《万岁通天帖》）、恽南田诗札真迹、宋拓《皇甫君碑》等。先生的考校，同样精心用意。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先生对这些碑帖的评判，还可以了解先生研习书法的变化历程，甚至可以体会到先生对一些古人的情感好恶。限于篇幅，仅以欧阳询《皇甫君碑》为例略作评说。

欧阳询《皇甫君碑》，先生所校，为翻印的文明书局影印本。考校精细，帖中有白粉小正书，分析字的安排结构，是过录张效彬之本。碑中有“精民感化，黠吏畏威”句。先生批注“精民，出淮南子，善人也”。只此一处，即非只知

死记硬背《金石萃编》《校碑随笔》者所能梦到。前后两跋，前跋特抄录别本中倪燿光论体质形质之说。可见先生对前人议论，凡有启发道理，不论人之名气大小，都充分注意。先生论书，根据人体的生理结构，书法工具的特点性能，乃至执笔的方式，书写的姿势变化，又结合自己长期的多方面的反复实践，总结出规律性的理论，破除迷信，不尚空谈，平实易懂，切合实际。这同先生善于吸取前人哪怕点滴的合理说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后面的一跋，针对翁方纲讲何义门批点书帖的记载，先生评云：“总之，何氏好批点书帖，于是若干不知谁何之批本，亦俱属之义门矣！不见原批字迹，终当以传闻待之。”对这位大考据家的言论，竟毫不以为然。先生论书绝句，言翁方纲鉴定欧阳询化度寺的荒谬，其注云：“庸医杀人，世所易知，名医杀人，人所难知，而病者之游魂，滔滔不返矣。”由此可知，先生这里对翁氏，已经是十分客气了。

启功先生校碑，最大的特点还是学问的融会贯通和书法研究的紧密结合。一般临习书法家观碑，多意在书法而不注意文句，先生则文意、史实、典故、用语修辞乃至音韵等都注意到了（《集王兴福寺碑》《龙藏寺碑》）。草书则旁注楷书，诗文则校订版本（张旭《肚痛帖》、彦修《草书诗》），典故则注明出处。很多评论，直接从文字演变与书法体势的关系，讲到书法史及临学前人必然出现的问题（跋《范式碑》）等等。这些见解的独到之处，是从任何书本上找不到的，特别是一些观碑和学书的经验总结，如《龙藏寺碑跋》：“近每习唐人楷书，以墨迹之点画使转，推证此碑笔意，真有顿还旧观之乐。”即先生论书绝句所说的：“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这对于那些按模脱镌地要写出“枣木板气”或碑刻风化残损后的“金石气”，特别是一些六朝碑的三角点、方头画的学书者，无疑是当头棒喝；而对于那些所谓“碑学”（实际上是学碑）书法家如包世臣、何绍基、康有为等关于书法问题的迷惑，可以说是指路的明灯一盏。

至于先生的临帖，这里看到的基本是先生早已形成了自己体势风格后的作品，已经完全脱离了“规规于形似”的人帖阶段。虽曰临，实际上是遗貌取神，是完全贯注先生自己的艺术再创造。即董其昌所谓“如哪吒析肉还母，析骨还父，自现一段清净法身”。所以无论临欧临柳，人们还是望而便知是先生之书。（因版面容量所限，本文略有删节。）



《坚净居丛帖》分临写、编辑、鉴赏、收藏辑三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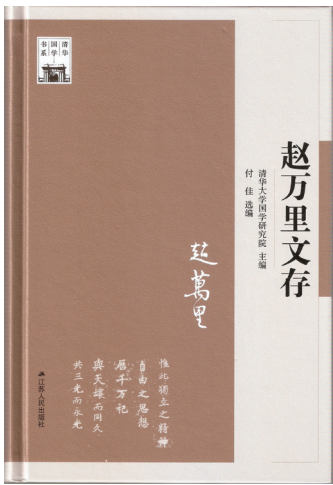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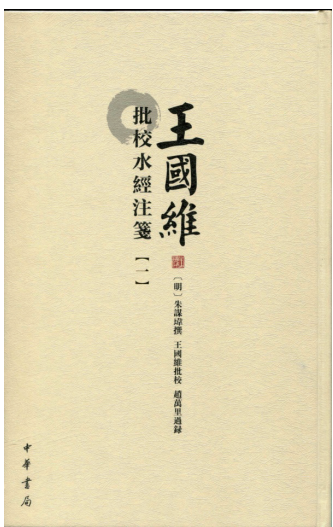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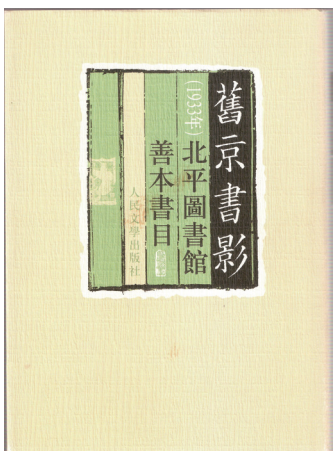
赵万里学术著作受出版者青睐

本报讯（记者刘晓立）赵万里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目录学家、版本学家，一生在古籍善本图书的采访、征集、编目、整理和研究方面，付诸了艰辛的劳动，著有《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版刻图录》等作品，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和好评，到现在还是不少版本目录学者的案头常备工具书。近年来，有关赵万里先生的学术著作也频频受到出版单位的青睐，其学术地位得到广泛认定。比如：

2011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旧京书影》。此书将赵万里先生所编《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与仓石武四郎编拍之《旧京书影》合璧影印。1933年出版的《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宋元明刊本及精校、名钞、稿本总计3796种，其中经部200种、史部1256种、子部707种、集部1633种，详细著录各书书名、卷数、著者、版本、残缺及批校题跋者。《旧京书影》收北平图书馆藏宋元善本书影716幅，原照片系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1928—1930年间在北京留学时所摄。两书珠联璧合，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北平图书馆的善本珍藏。

2011年12月、2012年9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赵万里文集》（全三卷）。本书第一卷收录关于王国维研究、版本学、《永乐大典》研究、目录学及文史考证等方面论文三十八篇，前附赵芳瑛、赵深编《赵万里先生传略》，后有宿白跋。第二卷收录词作、词曲学论文、序跋、校勘记、访书记、书评、史学讲义与回忆文章等，共九十余篇。第三卷收录古籍善本提要、经眼录，涉及古籍数百种，内容丰富，其中很多系由赵先生历年访书笔记中整理而来，且为首次发表。

2013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校辑宋金元人词》。全书七十三卷，自一百三十余种四千多卷古书中辑出宋金元七十位词人的词作一千五百余首。此书辑佚方法细密、体例谨严，辑佚书必详举出处，便于翻检原书、复核文字。每词均注明出处，一首词往往注明六七种来源，多者达



十二三种，均以时代为序。异文一一夹注于行间，校勘缜密。臆作或前人误题者作为附录列于卷后，并详加考校。此书引证之丰、校辑之精，远过前人，出版以后备受词学研究者推重，并为此后《全宋词》等历代词作总集的编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14年9月，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王国维批校〈水经注笺〉》。王国维先生对《水经注》校勘致力甚勤，手校明万历刻本朱谋瑋《水经注笺》所用校本凡六种，既博且精。赵万里担任王国维助教期间，临校该书王校本，为之留下一份珍贵的副本。王国维在临校本后写下一则题跋，记述了这段经历：“门人赵斐云酷嗜校书，见余有此校，乃觅购朱王孙本，照临一过，并嘱识其颠末。余近岁方治他业，未能力此书，忆初校此书时，距今才六阅寒暑，而人事之盛衰、文游之存亡聚散、书籍之流转，已不胜今夕之感。然则斐云以数月之力，为余校本留此副墨，亦未始非尘劫中一段因缘也。”此书以赵临王校本为底本影印。

2015年1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版刻图录》。此书为《中国版刻图录》的第五个版本。《中国版刻图录》最初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编成于1959年。全书收录唐至清中叶刻本书籍500余部，图版660余幅，分为版刻、活字、版画三大部分，按刻版年代和刻书地区编排，每幅图版都附有简洁精辟的说明，涵盖刻版特点、版本鉴定依据等内容，系统反映我国唐宋以来各时代各地区雕版印刷发展情况。出版以来备受版本学界看重，是公认的古籍图录经典巨著。

2016年10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赵万里文存》，作为“清华国学书系”之一，选录赵万里在王国维研究、版本目录学、古籍整理、词曲研究、墓志研究等方面的重要论文。

2017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赵万里抄校本选编》。此书收录了赵万里先生抄本校本的精华，计赵万里抄本17种、临王国维校本4种、手校本2种，附录相关文章作为使用参考。



林世田（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主任、研究馆员）

20世纪30年代是我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期，刊印善本古籍，服务学术研究，不仅是学术界的迫切需求，也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等古籍收藏机构的愿望。当时，袁同礼和傅斯年两位收藏单位和学术单位的执牛耳者一拍即合，倡议编纂《国藏善本丛刊》，得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商务印书馆的积极响应。《国藏善本丛刊》最关键的选目汇总工作即由精通版本目录之学的赵万里先生负责，他不但负责挑选北平图书馆的目录，并根据其他三家机构提交的目录，吸收各方意见，择其精要而成。从这份目录可以看出，这是当时规模宏大的善本影印项目，可与我们现在的《中华再造善本》相媲美。然而就在商务印书馆印行《景印国藏善本丛刊样本》之后的三个月，日寇发动“八一三事变”，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陷于停顿，《国藏善本丛刊》尚未正式开印，便功断垂成。

80多年来，国家图书馆唯一的名人塑像是第十六任馆长梁启超先生，相对于国家图书馆百年历史的文化积淀，不能不说有点孤单。今天终于有了赵万里先生的塑像，这是国家图书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表现，也希望一次为契机，将为国家图书馆馆藏建设、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陈垣、郑振铎、周叔弢、傅增湘等先生的塑像陆续安放在国家图书馆这个文化殿堂中，睹物思人，激励图书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刘波（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我曾经参与了部分赵万里先生文集的编辑工作，受益良多，感觉赵先生的学问和贡献，是需要我用一辈子去体会学习的。文集在2011、2012年陆续出版之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不少佚文，也发现了其中一些编校方面的错误，所以，我希望过几年能有机会给文集做一个增订，使它更完美，更能体现赵先生的学术和精神。此外，目前我利用业余时间在做赵先生的年谱，现在即将完成，期待有比较特别的资料可以更多的被挖掘出来。



程有庆：说说一部经典《中国版刻图录》

在我眼里，《中国版刻图录》就像一个经典电影，一部经典著作，从来没有被超越，也很难被超越。国家图书馆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史》影响也非常大，但作为古籍版本目录研究，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参考赵先生的《中国版刻图录》。因为《中国版刻图录》中的图和解释文字都是具有标本性的，可供其他学者参考研究；内容按时代地区排列，不仅方便比较相同版本，还可以比较地区的、时代的种种；选择的图录都是比较初始的印本，可靠性较强，意义极其重大。

就是这么一部重要的著作，我之前听说哪里要重印，还因为某某加了几张图就说是某某补本，在我看来，经典著作是不需要后来人加几幅图再如何如何的，因为它本来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作，有点问题不算什么。宿白先生在赵先生全集出版时写到《中国版刻图录》是赵先生最重要的著作，说这是代表20世纪60年代最高学术水平的著作，但因为时代的原因没有署赵先生的名字。我认为这对赵先生是不太公平的，现在我们应该基于客观事实，哪怕有些地方还有困难，但也要再多宣传宣传赵先生，宣传赵先生在《中国版刻图录》这部书上的重要贡献，给一代学者一个公平的待遇。

另外赵先生是充满爱国情怀的学者，他在《中国版刻图录》中选的《剑南诗稿》有两个宋本，一个《剑南诗稿》，一个是《剑南续稿》。《剑南诗稿》是严州本，我认为他判定的非常准确。可他对《剑南续稿》的选择，鉴定难度非常之大，都是残本。赵先生其实不必非要选那个版本进去，但是他对陆游这个爱国诗人充满了爱。陆游的诗句是带有旗帜性的，所以他要选两个陆游诗集的版本。

（本文作者程有庆乃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